

清代边疆地区的教化与稳定^{*} ——以广西宾兴组织为视阈的考察

熊昌锐 唐 凌

宾兴原为一种古老的礼仪，至北宋时期性质开始发生变化。清代广西的宾兴始于康熙年间宾兴租的出现，嘉庆时期创建的宾兴馆则已成为一种捐资助学的组织。终清一代，广西 13 府州建立了数目众多的宾兴组织。宾兴是封建国家和地方士绅合作的产物，通过宾兴，国家政策得以在地方实践，士绅则能够积极融入地方事务。宾兴推动了广西科举事业的发展，同时促进了地方教化和维护了国家边疆的安全与稳定。

关键词 清代 广西 宾兴 教化与稳定

作者熊昌锐，1986 年生，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唐凌，1955 年生，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地址：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邮编 541004。

隋唐之际，科举考试成为政府选拔人才最重要的途径，谓之“抡才大典”。士子科考的成功与否，不仅涉及家族兴衰，更关乎地方荣辱。因此，明清之际，各地纷纷出现各种助考组织资助贫寒士子应考，以增加科考成功的几率。宾兴就是当时各省盛行的助考组织中很典型的一种。清代宾兴的地域分布广泛、受益人群众多、管理制度严密，对维护边疆地区的教化与稳定乃至维系封建时代晚期的科举考试和统治秩序，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学界最早对宾兴进行研究的是杨联陞^①，他在研究南宋至清代士子赴考旅费问题时，指出在清中叶以后，出现了官绅士民合办的宾兴会等组织。目前宾兴研究渐成热点，但主要研究区域集中在江西等地。李才栋^②、邓爱红^③从宾兴助学助考的功能方面对宾兴开展研究，认为宾兴这种民间集资助学的形式，使得贫苦士子受益，并最终走上科考致仕的道路，对科

^{*} 本文为“人文强桂”基金项目“清代以来中越边区经济开发与民族关系发展中政府与民间力量的比较研究”（桂科软 05111010 号）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参见杨联陞《科举时代的赴考旅费问题》，《清华学报》1961 年第 2 期。

② 参见李才栋《古代地方助学助考机构——宾兴会》，《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5 年第 5 期。

③ 参见邓爱红《清代江西新建县宾兴会述略》，《南昌航空大学学报》2008 年第 4 期。

举时代的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邵鸿、^① 杨品优^②则从组织宾兴的阶层以及从宾兴对社会权势所造成的影响来进行研究，这对审视当时基层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视域。另外还有毛晓阳^③从科举与科举学等方面来探讨宾兴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对广西宾兴的研究，似乎稍显薄弱，多集中在桂东南地区。如杨天保、^④ 覃义炯、^⑤ 陈衍英^⑥等从桂东南宾兴组织的建置、沿革以及与地方社会秩序等方面进行研究。而对整个广西地区的宾兴组织研究，仅有宋永忠^⑦对清代广西宾兴分布的地域分析，唐佐明等主编的《广西考试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⑧对“宾兴之制”也有简要介绍。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爬梳地方史志，结合遗存的碑刻，试以广西地区的宾兴组织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行简要的分析。

一、“宾兴”——从礼仪到组织的演变

“宾兴”一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司徒》，其文曰“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物犹事也，兴犹举也，民三事教成，乡大夫举其贤者能者，以饮酒之礼宾客之。”^⑨《辞源》指出“宾兴，周时选举法，自乡小学举贤能而宾礼之，以升于国学。科举时代，地方官设宴招待应举之士，谓之宾兴，即仿古乡饮酒之礼。”^⑩可见，早期的宾兴当是一种古老的礼仪。

到了北宋时期，宾兴的性质开始发生转变。据《桂平县志》记载“自赵宋而后，诸路有宾兴之制，由是而立。宋绍圣元年，诏县学生三岁不赴升试者，除其籍。诸路宾兴会试辟难，独常州中选者多，后世宾兴之名，始见于此。”“其实亦书院之类，盖书院为乡学通称，古者家塾立于宗庙门侧。宾兴掌于乡大夫，亦属乡学，与家塾相连。”^⑪由此可知，宾兴已由

① 参见邵鸿《清代后期江西宾兴活动中的官、绅、商——清江县的个案》，《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4辑），上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② 参见杨品优《科举会社组织与社会权势的转移——以晚清至民国江西南康宾兴会为例的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

③ 参见毛晓阳《宾兴研究与科举学》，《厦门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④ 参见杨天保《晚清民国的宾兴组织与基层秩序——基于广西玉林地区的历史考察》，《广西文史》2009年第4期。

⑤ 参见覃义炯《兴业宾兴馆沿革》，《玉林县文史资料》（第4辑），政协玉林县委员会办公室1983年编印。

⑥ 参见陈衍英《玉林县宾兴馆的建置和财产史略》，《玉林市文史资料》（第11辑），政协玉林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86年编印。

⑦ 参见宋永忠《清代广西“宾兴”分布及流变的历史地理学分析》，《广西民族研究》2011年第1期。

⑧ 参见唐佐明等主编《广西考试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⑨（汉）郑玄注《周礼》卷3《地官司徒第二》，中华书局1992年版。

⑩ 广东广西湖南河南辞源编写组、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辞源》，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⑪（民国）黄占梅修、程大璋纂《桂平县志》卷14《学校下·宾兴》，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

一种礼仪逐渐演变为与书院、家塾性质相等同的机构，宾兴在这一时期已经开始与科举考试联系在一起。

进入清康熙年间，“学内宾兴田租，原康熙三十四年知府黄钟捐银一百两，置须罗乡田税米三石零一升，每年额收租谷六千二百斛”。^① 此处的“租谷”乃是作为宾兴租而出现。嘉庆时期直隶郁林州出现的宾兴馆，已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组织。“嘉庆十七年（1812），置城守街舖一座，租钱一十六千文，院东塘一口，填建宾兴馆，租钱十千”。^② 此时的宾兴已有专门的场所，置有产业，亦有维持其组织活动的经费。至此，宾兴已经完成了从一种礼仪到助学组织的转变，不再附于官学（府、州、县学）或书院之下。其后，郁林直隶州临近诸县也开始创建宾兴馆，这一活动很快传遍整个广西，即便在偏居桂西的凌云，在光绪年间也已建有宾兴馆。

科举制度废除后，宾兴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其产业或被组织者后代收回，或被划归新式学堂。罗城县属龙岸墟设有宾兴一所，科举废后，产业为组织者之子孙收回，今查其馆址即龙江商会。^③ 贺县，则在科举废后，将宾兴租划归第一高小校收管。^④

清代广西的宾兴作为一种独立的组织，必然存在着维持这个组织运转的资金和管理制度。但各宾兴组织由于规模大小不同，经费多少各异，从而对助学的范围、人员、数额等方面都有不同的规定。

二、宾兴经费来源与经营管理

（一）宾兴经费来源

宾兴作为一项资助地方士子参加科考的公益基金组织，其经费是整个活动的关键。宾兴经费从何而来，如何确保经费的延续性，如何进行日常管理，这些都关系到宾兴捐资助学活动能否顺利展开。

封建国家积极支持宾兴事业，为此专门拨出资金。“顺治八年，定举人公车，由布政使给与盘费，云南贵州，每一名三两，仍给驿马，安徽二十两，江西湖北十七两，福建十五两，湖南十四两，广西十二两，俱于领咨日给发”。^⑤ 镇安府规定，经知府核定章程，“所筹一千五百两经费，自光绪十七年起，按年得息钱四百八十千文支给各项公费，余钱作宾兴经费，又钱三百千文，按月一分五厘，每年息钱五十四千文作宾兴经费”。^⑥ 另有直隶郁林州“以陈宅垌田三十丘，计租六十石，归入宾兴为永业（田），递年取租息，支会乡试盘

①（清）王栋续纂《苍梧县志》卷11《学校志·经费》，梧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6年复印。

②（清）冯德材修、文德馨纂《郁林州志》卷6《建置略二·宾兴》，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

③ 参见（民国）江碧秋修、潘宝籙纂《罗城县志》卷5《文化·清代教育》，成文出版社1975年版。

④ 参见（民国）《贺县志》卷3《教育行政》，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

⑤ 《钦定科场条例》卷6《起送会试》。

⑥（清）羊复礼修、梁年纂《镇安府志》卷15《建置志三·宾兴经费》，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

费”。^①

科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官员的政绩和士绅的名望，所以，他们积极乐捐，支持宾兴活动。道光年间，梧州知府万保全“拨卖工滕木银一百六十两，邑人李百龄捐银一百两，共银二百六十两，归台山书院，交典商每月每两生息一分二厘，四季缴收”。又道光三十年，李百龄继室淑人陈氏“捐送府江燦坡田一契，土名塘肚田八丘，外宕田一段，撑鹿岩田一段，撑鹿涌田七丘，里宕田六丘，青山岛田四丘，金山宕田一段，粟涌田一源，勒涌田一源，每年租谷约三千余斛，税米归书院充纳”。^② 藤县何昌光、何斗光“捐银二百四十两，苏念祖捐银二百一十两，胡毓璠、胡毓璜捐银七十两，俱归入宾兴馆，以作育人才之用”。^③ 另有陆川吴裕湘兄弟“捐拨田租五十石六斗，王文谟捐拨田租二十四石，先年经众议决派三百石为会试川资，余为新生修贄童生卷结及春秋祭祀、纳粮等项费用”。^④ 雒容合邑士绅劝捐以为宾兴，历三考共捐银八百余两生息，值乡试期，以息银分给士子作川资，以为鼓励。^⑤ 同时，官员和士绅的倡捐活动，会得到封建政府的嘉奖。光绪年间“以捐助地方善举，予广西右江道张汝梅、思恩府知府刘思濬，各为其父母建坊”。^⑥ 这也是地方官员和士绅热衷宾兴事业的原因之一。

宾兴经费来源的另一个主要渠道则是充没部分无主之产。郁林“老宾兴原有租一百六十石，系道光九年（1829）断买吴景纯兄弟债欠鞦韆田，地田九十八丘，租一百六十石拨入（宾兴）”。^⑦ 光绪二十六年（1900），将断受吕绍霖等“四契田租一百余石拨入三峰书院为膏火费，至光绪三十年科举停罢，又拨租五百余石为办学经费”。^⑧ 另有土匪被官府剿灭后，其掠夺的逆产除有主之产归还原主外，无主之产则充作宾兴。同治四年（1865），容县署县潘英章将境内土匪剿平，将土匪劫掠而来的田产（除原主赎去不计外）租赁给百姓，“得租五万多斛”，捐入宾兴。^⑨

此外，部分宗族祠产和富绅殷商的募捐，也是宾兴经费的来源之一。

（二）宾兴经费管理

宾兴经费多设专人管理。镇安府规定“此项经费分给泗镇两府赴试士子，现并归各属黄善局，经费各年由绅士经管，府县察核数目。”^⑩ 北流宾兴馆公举邑中“殷实绅士三人管理收支，三年一易，于子、午、卯、酉年五月十六日祭祀时清算交代”。^⑪ 贺县宾兴馆派

①（清）冯德材修、文德馨纂《郁林州志》卷6《建置略二·学校》。

②（清）王栋续纂《苍梧县志》卷11《学校志·经费》。

③（清）《藤县志》卷8《学校志·书院》，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

④（民国）《陆川县志》卷9《学校类一·宾兴》，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

⑤参见（民国）唐本心《雒容县志》卷上《经政》，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

⑥《清实录·德宗实录》卷297，光绪十七年五月初三日。

⑦（清）冯德材修、文德馨纂《郁林州志》卷6《建置略二·学校》。

⑧（民国）《陆川县志》卷9《学校类一·宾兴》。

⑨参见（清）易绍惠修、封祝唐纂《容县志》卷12《学校志·书院》，成文出版社1974年版。

⑩（清）羊复礼修、梁年纂《镇安府志》卷15《建置志三·宾兴经费》。

⑪（清）徐作梅修、李士琨纂《北流县志》卷9《学校》，成文出版社1975年版。

“首事四人董之，三年更代”。^①平乐绅士二人董理其事，每届岁试，董事将出入数目当众清账，另外重新选举董事，不得谋求连任。^②制定如此细致的规则，目的是为了宾兴经费管理的透明化和制度化。

宾兴的资助额度和范围也有严格的规定。苍梧的学内宾兴曾规定“每年额收租谷六千二百斛，变价除纳赋税外，存银收寄县库，遇乡试年，解府给发府县两学文生赴省应试各三分之一，会试亦三分之一，武生多属家裕，不藉资助。”^③容县“文武新进生员结金，县学每名给二十两，府学每名加六元。其余应乡试者有卷金，应会试及优拔廷试者则有水脚银，文武科甲则有红花银”。^④桂平邑绅黄榜书创建合邑宾兴时，曾制定《宾兴育才公定条约》，涉及宾兴资助额度、资助群体等，内容具体而详尽，多达28条。^⑤此外，部分宾兴经费也用作管理人员的报酬以及维修宾兴馆等开支，但数额是有限的。

宾兴的资助范围一般限于乡会试，没有科考的年份则开支较少，因此，宾兴经费大多用来置产生息。武鸣宾兴馆“一东边铺屋二间，租项为试院，岁修及岁科两考廩保齐集书院，认保饭蔬公费赢余者归入宾兴。一西边铺五间，租项为宾兴卷资”。^⑥宾阳宾兴公所“公田共五百一十坵，税地二百四十八亩四分五厘三毫，每年租谷额三万四千六百七十斤正。培福堂公田共六百九十六坵，税地四百九十八亩四分一厘八毫，每年租谷额八万二千六百九十斤正”。^⑦清朝及民国时期，镇边县还有族田和公田，族田属各宗族共有，轮流交给本宗族耕种，不收租，其收入拿来作年终族人聚餐之用。公田，也称“宾兴学田”，政府占有，出租给农民耕种，由财政部门收租，用于兴办教育事业。^⑧容县宾兴馆甚至在很多乡里购有田产，租数如下：附城各里共租136000余斛；自良共租19500斛；杨梅共租58400斛；黎村并信宜五甲共租12500斛；水里租3000斛。^⑨总之，利用宾兴经费购置产业，发典生息，利于宾兴捐资助学的活动能够持续进行。

到了清末，广西推行“新政”，创建各种学堂。桂省学务经费、高等专门及省城公共学堂由库预支，各府（直厅州）官立学堂由各层摊解，地方办学之款，则以庙产、收屠捐、充匪产为大宗。屠捐一项系于光绪二十年（1894）匪乱频仍，奉令征收为办团养练之用，嗣以团练裁消，乃于三十三年（1907）由提学使饬为办学之用。至科举时代遗留之书院膏火、义学东修、宾兴公产以及各姓祠堂花红等款，亦多为办学经费。^⑩可见，晚清时期的宾兴与义学，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①（民国）《贺县志》卷3《教育行政》。

② 参见（清）全文炳修、伍嘉猷纂《平乐县志》卷5《学校志》，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

③（清）王栋续纂《苍梧县志》卷11《学校志·经费》。

④（清）易绍惠修、封祝唐纂《容县志》卷12《学校志·书院》。

⑤ 参见（民国）黄占梅修、程大璋纂《桂平县志》卷23《学制上》。

⑥（民国）温德溥修、曾唯儒纂《武鸣县志》卷4《建置考·试院》，1915年刊本。

⑦《宾阳县志》第4编《经济》，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1961年翻印，第269页。

⑧ 参见广西那坡县志编纂委员会《那坡县志》第3编《土地制度》，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页。

⑨ 参见（清）易绍惠修、封祝唐纂《容县志》卷12《学校志·书院》。

⑩ 参见桂林市教育志办公室编《清末民初广西兴学纪略》，1987年内部印行，第30页。

三、士绅在创建及管理宾兴中的活动

宾兴的创建及管理都离不开当地的士绅集团。^①如桂平邑绅黄榜书、程家谟先后创建阖邑宾兴、本里宾兴。“黄榜书，字少瀛，居县北宣一里古莲村。幼而志学制艺，法前明清初诸大家，兼攻诗古文辞，邑令陈如金爱其才，试四场皆取冠军，旋以案首选……己卯登贤书，己丑大挑取知县，是年成进士，授户部主事……以一邑之大，不可无育才之所，迺呼众捐款购产，设馆为阖邑宾兴，手定条例，约士子岁科试及春秋两闱，与内官供职于京者，皆津贴之。乙巳后，邑中新政迭兴，如劝学所、师范中学、蚕业诸学堂与地方自治，无不凭借宾兴成立，饮水思源，咸以为榜书功。”^②黄榜书不仅带头捐资创建了阖邑宾兴，更是亲自制定管理条例，资助士子参加科考，津贴当地京官。程家谟，字弼臣，居城南军陵里官河村。幼在塾诵经传，殆遍年十三，以洪杨事起，世乱辍读。二十五岁始受业于贡生张世珍，自以时过而学，恐不及发愤忘寝食。越五年，为郡诸生旋食廪岁科试时，列一等。应秋闱屡荐不售，年当强仕，因教学积劳咯血，亟调养，遂绝意科举，以贡生终其身。光绪十二年（1886），邑绅黄榜书创立阖邑宾兴，嘉谟在里内劝捐，得千余金，助成其事。十四年（1888），复创立本里宾兴，捐款不多而能掌之，以勤守之，以洁遂积微成巨。十八年（1892），购馆于厢内福寿坊，以居应试士子，并祀乡先辈、木主，复置田出息津，助岁科及春秋两闱盘费。^③程家谟响应黄榜书的号召，积极倡捐，助其创立阖邑宾兴，后来又亲自创立本里宾兴，修筑宾兴馆供士子居住，并资助士子应考。

容县的黄鹏霄、黄金銜父子，封抡英、封蔚初、封鹤君祖孙三代亦在创建和管理宾兴馆起着重要的作用。黄鹏霄，“字莲槎，元坝孙，年弱冠以选拔举于乡，借补修仁训导，迁河池学政，截取到班以道梗不赴，咸丰之乱，率团防剿，备极劬勤，叙功晋同知衔，赏花翎。性刚毅，能胜艰巨，复城后，诸事草创，多资经画，又以士族单寒艰于进取，特倡捐宾兴，经营建馆置产，凡进庠结金及乡会试舟车水脚，均从取给，士林实受其庇，历掌往经、肃江讲席，鼓舞振兴，多有成就”。^④太平天国起事后，当地文教事业受到巨大冲击，士子贫寒无法应试，黄鹏霄积极倡捐，修建宾兴馆，资助科考士子，其子受其影响，亦热心宾兴事业，并将宾兴推广至云南。“黄金銜，字鹿湖，鹏霄出嗣子，权奇多智，为诸生时，督团杀贼，保荐知县投效云南，滇师岑毓英器之，奏请留滇补用，檄署云南县事时，丧乱甫平，游

① 张仲礼在《中国士绅——关于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一书中以学衔与功名来划分绅士集团，认为整个绅士阶层可分为上、下层集团，上层集团则由学衔较高的以及拥有官职——不论其是否有较高的学衔——的绅士组成，下层集团包括生员、捐监生以及其他一些有较低功名的人。费孝通在《中国绅士》中提出“绅士是退休的官僚或是官僚的亲属，或者是受过简单教育的地主。”瞿同祖则认为中国士绅阶级实质上就是“一个以非正式权力方式控制地方事务的权利阶层”。清代的绅士阶层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官员，包括现任、退休和被革职者；二是各级学衔获得者，包括文武两科。虽然学者表述不同，但他们对士绅的定义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士绅受到儒学教育，经历过科举考试，在当地社会有一定的地位和威望。

② （民国）黄占梅修、程大璋纂《桂平县志》卷34《贤能》。

③ （民国）黄占梅修、程大璋纂《桂平县志》卷34《贤能》。

④ 参见（清）易绍惠修、封祝唐纂《容县志》卷18《人物志》。

勇偏据城厢，昼夜劫掠，莅任下令驱之，众慑其威皆帖耳，去复筹给牛种，清丈田亩，复拨叛产为宾兴，书院经费日不暇，给邑人士立祠祀之。”^①

光绪三年（1877），邑绅黄鹏霄、封抡英等倡捐宾兴经费，“始卜吉建馆，为屋三座，正座祀各捐资乡先生，中座为大厅，前为门楼，两廊为仓。左廡为办公所，旁为厨，右廡为客厅”。^②封蔚初，“字少霞，卫世元孙，父抡英，监提举，衔花翎，负干才，乡居排难解纷，众情推重，尤急公好义，襄建宾兴馆，增置田业及兴造城北文昌楼，皆资其力。蔚初少秉庭训，咸丰三年成进士，入值中书省，协办侍读事，寻以母忧归，时故乡沦陷，奉劳中丞檄，回容县相机剿抚，而时局日坏，功迄无成，后从戎楚北，积功荐保知州”。^③封鹤君，光绪二十六年（1900）举人，曾以试用知县分发湖北，受其父祖影响，热心于宾兴倡捐，民国年间，同样积极支持社会公益事业。

钟章元曾创建郁林宾兴馆，并亲自撰写《创建宾兴馆记》。钟章元认为：宾兴馆既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民间组织，则对家贫而志于学的人应予资助。然而清代科举取士有规定：读书人想参加县（州、府）试，须有廩保资格的人担保，要给“廩保钱”才得报考，考后如中了秀才，又须向主考官送“朱笔资”，主考收受后，用红朱笔在考生名上打“点”，才能名列榜上。因此，部分贫寒士子，往往因筹不到廩保钱和朱笔资而无法参加科考，以致埋没不少人才。钟章元有见于此，乃向广西学政建议，“凡属宾兴馆牌位的裔孙”，都由宾兴馆给予应缴的廩保钱和朱笔资。^④这个建议，后来被学政采纳。同时，这也调动了士绅、富商积极捐助宾兴的积极性。

北流的梁宗敏、李敏阳也积极筹建宾兴馆。梁宗敏，“号逊斋，别号异皆，一厢人，幼聪颖，长嗜学，援笔成文，肄业学益进，嘉庆丙子登贤书，庚辰成进士，历掌北流、陆川、兴业各书院，文风丕振，道光癸巳年，官直隶南县令，以经术为吏治，政平讼理，公余授诸生，经建书院育人才，民风一变。咸丰元年，宗敏与李敏阳等筹建宾兴馆，劝捐置产，为士子出身之费”。^⑤李敏阳，“字仲阳，号晓谷，治泰次子，少聪，读书过目不忘，博通经史。嘉庆辛酉登贤书，丙子修邑志，多出其手，曾任容县、罗城、临桂等县教谕”。^⑥梁宗敏、李敏阳等人也参与北流宾兴馆日常事务的管理，保证了其正常运作。

随着各种各样宾兴组织的独立创建，宾兴附于官学、书院、社学的历史结束了。嘉（庆）道（光）时期以后的宾兴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涉及面广、影响力深的社会公益组织而出现，与社学、义学等都属于科考推行过程中比较独立的体系和组织。

四、清代广西宾兴的分布情况

清代广西宾兴，其组织形式有多种层次，有里办、联里合办、全县合办等多种形式，各

①（清）易绍惠修、封祝唐纂《容县志》卷18《人物志》。

②（清）易绍惠修、封祝唐纂《容县志》卷12《学校志·书院》。

③（清）易绍惠修、封祝唐纂《容县志》卷18《人物志》。

④ 参见政协玉林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玉林市文史资料》（第14辑），1987年编印，第6页。

⑤（清）徐作梅修、李士琨纂《北流县志》卷18《人物》。

⑥（清）徐作梅修、李士琨纂《北流县志》卷18《人物》。

自拥有一定数额的资金和产业。宾兴的组织形式多样，且宾兴组织数目众多。下依据文献资料列表如下。

清代广西宾兴组织分布情况表^①

府州	宾兴馆名称	创建时间	创建地点	宾兴金额总数
直隶郁林州	郁林宾兴馆	嘉庆十七年（1812）	郁林州院东塘	26000 文
	郁林宾兴馆	道光三十年（1850）	紫泉书院左侧	钱 5000 多贯，租 2800 多石
	北流宾兴馆	咸丰元年（1851）	县学附近	田租 708 石，年租 14000 文
	合邑宾兴	咸丰十年（1861）	陆川城东北隅	田租 300 余石，数百两银
	石南宾兴	同治六年（1867）	兴业县学附近	37000 文
	博白宾兴	—	博白县学	田租 230 石
浔州府	白石宾兴	同治六年（1867）	桂平白石山	—
	上都里宾兴	同治八年（1869）	桂平城厢西门街	—
	城厢宾兴	同治年间	桂平城隍街南向	—
	吉一里宾兴	光绪五年（1879）	桂平木乐圩	—
	城厢宾兴	光绪七年（1881）	贵县东门街	—
	通乡宾兴	光绪十年（1884）	贵县西街通乡	—
	合邑宾兴	光绪十二年（1886）	桂平城厢西门街	共得银 40000 多两
	本里宾兴	光绪十四年（1888）	桂平厢内福寿坊	共得银 1000 多两
	军陵里宾兴	光绪二十年（1894）	桂平城内福寿坊	—
	宣一里宾兴	—	桂平大黄江墟	—
	龚南宾兴	同治八年（1869）	平南城厢	430 石租谷
	南河宾兴	同治八年（1869）	平南县	—
	平南宾兴	同治十二年（1873）	龚州书院	阖邑绅士集银 40500 两
	惠政宾兴	同治年间	平南惠政里	—
	路三宾兴	同治年间	平南路三里	—
	劳五宾兴	同治年间	平南劳五里	—
	劳里宾兴	光绪年间	平南县寺面圩	—
桂林府	临桂宾兴馆	—	府学院内	200 余两金
	义宁宾兴	—	县学附近	—
	兴安宾兴	同治年间	县学附近	—
	灵川宾兴	光绪年间	县学	600 余两银
	恭城宾兴	—	县学	—
	全县宾兴	—	全县	—

^① 主要依据《中国地方志丛书·广西省》，成文出版社影印本，共 56 种；（清）王栋续纂《苍梧县志》，同治年间；（清）夏敬颐修、褚兴周纂《浔州府志》，光绪年间；（民国）温德溥修、曾唯儒纂《武鸣县志》，1915 年刊本；唐志敬编著《清代广西历史纪事》，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那坡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那坡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邕宁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邕宁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梧州府	容县宾兴馆	道光二十六年 (1846)	西绣书院旁	200 两金、200 两银
	苍梧宾兴	咸丰年间	—	租谷 6200 斤
	容县宾兴馆	光绪五年 (1879)	容县县署附近	共得义资约 20000 两
	合邑宾兴馆	光绪年间	怀集县学	—
	藤县宾兴	—	县学附近	—
	城防宾兴馆	—	怀集城防	—
平乐府	平乐宾兴馆	同治二年 (1862)	城内高科街	—
	贺县宾兴	光绪九年 (1883)	县学附近	5000 余金
	信都宾兴	光绪三十二年 (1906)	—	1500 两银
	昭平宾兴	—	县学附近	—
柳州府	罗城宾兴馆	—	龙岸墟	—
	东乡宾兴馆	光绪二十一年 (1895)	柳城大浦镇	5000 余金
	东泉宾兴馆	—	柳城东泉镇	—
	雒容宾兴馆	光绪年间	县学内	800 余两银
思恩府	思恩宾兴馆	咸丰年间	环江书院内	—
	宾州宾兴馆	光绪三年 (1877)	县学内	6000 余缗
	武缘宾兴馆	—	武缘书院内	—
南宁府	邕宁宾兴馆	光绪年间	邕宁县学	—
	横州宾兴馆	—	县学附近	—
	宾阳宾兴馆	—	今宾阳中学	—
	隆安宾兴馆	—	隆安县	—
镇安府	镇安宾兴馆	光绪九年 (1883)	—	1500 两银
	那坡宾兴	光绪年间	县学附近	—
	奉议宾兴	光绪年间	奉议州	—
归顺府	雷平宾兴	道光年间	雷平县	—
	雷平宾兴	光绪年间	镇边县	—
	镇边宾兴	光绪年间	雷平县	—

此外，泗城府建有凌云宾兴馆，上思厅也建有宾兴馆。除庆远府与太平府外，广西 13 府州中建有 56 个宾兴组织，实际所建宾兴应多于此数，另有“培育社”、“黄善局”、“文昌会”等组织不在本文统计之内。从清代广西宾兴的分布地域来看，桂东南地区是宾兴最为集中的地方，尤以浔州府为甚（建有 17 个宾兴组织），这应与太平天国在此举事，对科举的破坏和对科甲士绅的打击密切相关。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官府和地方士绅合作，积极创建宾兴等助学组织，目的是为了重新恢复科举考试和确立封建政府的统治秩序。

五、清代广西宾兴的社会功能

宾兴在广西境内分布广泛，受益士子众多。因此，宾兴对推动广西科举事业的发展、促进地方教化乃至维护地方稳定和国家边疆安全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一）推动科举事业的发展

清初，广西战乱不止，社会动荡不安，直至顺治十三年（1656）才较安定。清代广西乡试迟至顺治十四年（1657）始首度举行。文科会试由礼部主持，于京师举行。会试中额，清初无定额，直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奏请钦定中额，大约每 20 人取 1 名。据《清实录》

记载：乾隆年间广西每届会试取中2—8名；嘉庆年间3—5名；道光年间5—10名；咸丰年间2—8名；同治年间11—14名；光绪年间11—13名。从会试中额数量可看出道光之后有所增加，咸丰年间因太平天国运动冲击有所下降，同治年间又得以回升。清代广西士子考中进士者，共585名（含恩赐），从清初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共有93名进士。^①这也意味着广西在创建宾兴后，产生了492名进士，占总数的84%。最早成立宾兴馆的直隶郁林州中，有清一代中举人者逾百人，高中进士者总共有25名，其中宾兴馆创建后高中进士者15名；钟章元所在的州珮村高中进士者6名，州珮村5名进士（除钟章元）皆受过宾兴资助。^②由此可看出，宾兴对科举的巨大推动力。咸丰元年（1861），梁宗敏、李敏阳倡建北流宾兴馆，广置田产作为资助生员读书、应试和奖励登第士子之用。县内又办起六里、扶阳等书院。因得地方官绅倡导，县人好学成风，故清代北流科第居广西各县前列，中式进士23名，举人215名。^③《鼎建陆川宾兴馆记》中记载“是年两科并举诸生联袂观光，倍于曩昔，登文武贤书者五人，历次科竟八人之多。乙丑春闱，续报泥金，为从前仅有之事，猗款盛哉。因思桃李之姿，经培养而益腾其茂，璠玠之质勤拂拭，而倍发其者光。天下事创始较难而收效较速，断未为其事而无其功者，类如斯也。”^④陆川创建宾兴馆当年，科考就取得了巨大成功。郁林文寿华虽中秀才，但因家境清贫，无法筹足赴省乡试盘费，在县宾兴馆未建置前，毫无公费补助情况下，而致延误了两届乡闱。^⑤后文寿华高中进士，与钟章元等创建宾兴，资助地方士子参加科举考试。

“夫人无所激动或颓然不振，有所奖励必奋然以兴，况有进身之始以逮升乡升国升朝，无不化为之筹，而修脯饩牵之必备，孰不企云程而鼓舞哉，盖燕乐之嘉宾，凤翔之吉士，胥由是联翩而起矣，而为其事者有其功，邑长老志切树人，亦同享百获之报矣。”^⑥由此可见，宾兴的助考行为对科考士子的巨大鼓舞作用。

（二）渗透教化力量，维护地方稳定和国家边疆安全

清代宾兴是对日渐衰落的科举制度的有益修补。广西地处西南边陲，地方稳定对国家边疆安全十分重要。明人有言“广西民四而瑶六，民，汉人也；瑶，土人也。盖主客之辞，就土人言，曰壮、曰苗、曰瑶，大干凡三，而支族数十，今统曰边疆部族，于古为百越、为扬越、为骆越、为陆良之氏，视为蛮夷，摈不使而诸夏齿，秦定百粤，汉开几郡，种人渐被声教，治自列于中国，唐于岭南治边置羁縻州，宋于溪洞置左右江道，稍稍以中国法度整齐

① 参见李德韩、孟荫昭主编《广西通志·教育志》第4章《科举》，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页。

② 参见玉林市志编纂委员会编《玉林市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56页。

③ 参见北流县志编纂委员会《北流县志》第24编《科举》，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31页。

④ （民国）《陆川县志》卷23《艺文类一》。

⑤ 参见政协玉林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玉林市文史资料》（第15辑），1988年编印，第68页。

⑥ （清）徐作梅修、李士琨纂《北流县志》卷22《艺文志》。

之。”^①清代咸丰年间地方动乱，文教事业受到巨大破坏，士绅为了继续巩固在地方的统治，通过创建宾兴，使士子纳入科考致仕的道路，涵濡教化诸族。“献均字晓江，献锦弟，附贡生，咸丰间与献锦办团御匪，倡修学谱，创立白石宾兴。”^②虽然录取名额有限，但有了宾兴的资助，至少使士子不会铤而走险。“迩年来，余氛不靖，治军未遑，司民牧者，每以集团筹饷为急，故以文士而立军功者，所在多有知励学者也。陆川地界，南徼风气素劲，诸绅锐意敦文教，谆谆以宾兴为亟，诚为知先务者矣。明时阳明先生统军征蛮，所至敬教劝学，专以诗书之气，化强悍之风，至今思慕不衰，立祠祀之，颜曰王文成公讲学处。璉不才，不敢希纵曩哲，窃附斯义。原陆人士遵守勿失，他日人文鹤起，甲第蝉联，除则为硕学，出则为名臣，如油太守杨观察、黎孝子、庞嘉鱼诸先生，忠孝节义得入名宦乡贤，馨香俎豆与东山瀑布千秋长流。”^③陆川一带本属民风剽悍之地，知县覃远璉希望通过鼎建宾兴来教化治下子民，以靖地方。同时，通过科举吸纳士子参加科考，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无形中减少了他们聚众造反的可能。这对维护地方社会的稳定和国家边疆安全也有着一定作用。

（三）消除移民入仕障碍

明清之际，移民入桂，已成为一种风气。其中，粤商通过西江流域迁入者，更是络绎不绝。而这类新迁入者无法马上冲破地缘限制，融入当地社会，演变为真正的地方居民。但是，古代中国严格的科考制度中的资格审查制度，仅童试就需上溯三代，以杜绝“冒籍”与“借籍”之弊。而这类规定显然就与根基不定的移民阶层产生了鲜明的矛盾。

按照北流宾兴章程的规定，各捐主列为成员后，“其子孙皆得沾惠”，上举应考等事宜，可不经政府审查，概由宾兴馆代办。^④由此，新入移民参加科考的瓶颈即入仕障碍得以消除。明清时期的移民进一步促进了广西的经济发展和边疆开发，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维护边疆稳定的作用。

五、余论：透过宾兴看国家与地方士绅的关系

前述宾兴资产中有不少为士绅所捐，且大多数的宾兴组织从创建到日常的经营和管理，地方士绅都在其中起着关键的主导作用。宾兴组织主要由士绅倡捐设立，或者由地方官员倡导、士绅牵头设立，即“官倡绅办”，这是最常见的方式。

太平天国运动以及天地会等会党起义沉重打击了清王朝，为了镇压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清政府开始放权给地方，中央集权日益衰弱地方士绅通过举办团练等活动，掌握地方实权，自治倾向严重，士绅权力得到进一步的扩张。然而，地方士绅并没有将这种权势运用到瓦解封建等级制度，而是通过创建宾兴来完善科举考试以及维护封建统治旧秩序。从广西地区宾兴组织的创建者和管理者的背景来看，士绅尤其是科甲正途士绅在宾兴的运作中处于主

① 李彦福 《广西教育史料》，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79 页。

② （民国）黄占梅修、程大璋纂 《桂平县志》卷 34 《贤能》。

③ （民国）《陆川县志》卷 23 《艺文类一》。

④ 参见（清）徐作梅修、李士琨纂 《北流县志》卷 9 《学校》。

导地位，譬如郁林的钟氏家族、容县的封氏家族。钟章元有五子，其中钟龙洲和钟鹿洲（庆魁）是举人；他的孙子、钟鹿洲的儿子钟承祺也是进士，钦点内阁中书，曾任湖南省长沙知府，后升道台。这样，在钟章元的子孙中，有三人登科甲，连他共四人联系起来，获得“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科甲”荣誉匾额。这种称号牌匾在玉林地区附近各县所仅有，也是广西所罕见的。另一方面，清末非科甲出身的官员在政治势力上呈现愈来愈强的趋势，科甲出身的士绅为挽救自身的颓势，企图利用宾兴来力挽狂澜，而事实上宾兴的创建及其运作，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宾兴创建后，广西科考名额大幅增加。这些高中的士子成为封建国家的官员后，理所当然地维护科甲正途士绅的利益，从而增强了科甲士绅的实力。

宾兴的创建，是封建国家和地方士绅合作的产物。封建国家的政策要在地方得以实践，需要地方士绅的支持。而士绅为了继续巩固自己的利益，参与地方事务，需要依靠国家力量。因此，清代宾兴组织的创建和管理，封建国家在其中起着倡导和表率作用，而真正发挥主导地位的却是士绅阶层，士绅主观上是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但客观上也维护了封建国家的利益。国家力量和民间力量的协调与合作，应是以后开展宾兴研究新的切入点。

（本文责任编辑 宋培军）

· 书 讯 ·

吉林大学程妮娜教授著《古代东北民族地区建置史》已由中华书局于2011年7月出版。

《古代东北民族地区建置史》是作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修改、增补而成的，全书40万字，由绪论、汉至北朝时期东北民族地区建置、隋唐王朝东北民族地区建置、辽朝东北民族地区建置、金朝东北民族地区建置、元朝东北民族地区建置、明朝东北民族地区建置、清朝东北民族地区建置、余论等九章构成。《古代东北民族地区建置史》试图从国家结构的角度对东北民族地区建置的起源、转型与发展进行梳理，以探讨古代中国不同时期东北民族地区建置的形式、特点与政治功能，进而阐述其对古代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与巩固的关系。该书对古代中国东北民族地区建置的梳理为我们了解东北民族地区建置发展历程提供了极大方便，而作者从东北地区局部入手以阐明我国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特殊建置进行管理是一种历史传统，也给我国的边疆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思路。

uquan , Guazhou , Shazhou and Hami. The clan of King Bin , who guarded the northwest , resisted the intrusion of Haidu , the late king of the Wokuotai lineage , and Duwa , the late king of the Chagatai lineage as well as other rebellious forces , and protected Hexi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from the ravages of the war.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the northwest frontier , the clan of King Bin adopted a series of measures such as developing agriculture , especially stationing troops to open up wasteland to ensure the supply , repairing the posts to unclog the post road. Meanwhile Buddhism was also supported to resist the eastward invasion of the Islamic forces. These measures consolidated the northwest frontier defense effectively , thus the northwest society were relatively stable.

Key words: Mongolia the lineage of King Bin the northwest frontier defense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ity Walls in Yunnan Province in Qianlong Period

..... Ma Yahui (37)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emperor Qianlong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ity Walls in Yunnan Province and emphasized the fastness and orderliness of the walls , the functions of frontier defense. He put top priorities to the walls in the strategic border areas and managed the construction funds strictly in order to avoid corruption. The officials and the common people in Yunnan province had also donated to repair the walls in order to protect their homeland. The governor – general of Yunnan and Guizhou , the grand coordinators of Yunnan even surveyed the walls themselves after the comple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ity Walls in Yunnan enhanced the strength of border defense and the influence was far – reaching.

Key words: Qianlong Yunnan the city walls frontier defense

On the Change of Administrative Regionalization of Qinlian (钦廉)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China Era

..... Gao Maobing (46)

In the late Qing and the early Republic China , the Qinlian district of Guangdong had been proposed to be incorporate to Guangxi province for three times. This idea was first brought up in the last years of the Guangxu period , with the idea of changing Guangxi' s capital city to Nanning. However , this attempt had failed due to the vehement opposition of the Guilin officials and gentry and the grave financial situation at that time.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 with the increasing power of the old Guangxi warlord , the idea was proposed for the second and third time. But the attempts had not been realized because of the powerful opposition of the local folks 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Guangdong and Guangxi Province. By analyzing this , the thesis argues that in the research of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 we should not only consider the traditional factors , but also the will of the common people , the power of local gentry merchants and the influence of modern newspapers.

Key words: the late Qing and the early Republic China era Qinlian district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The Enlightenment and Stability of the Borderland Areas in the Qing Dynasty——Viewed by the Investigation of Binxing Organization (宾兴组织) in Guangxi

..... Xiong Changkun Tang Ling (56)

Binxing was an ancient etiquette , and the nature of it began to change in the Northern Song Dy-

nasty. Binxing of Guangxi in the Qing Dynasty dated from the Binxing rent (宾兴租) which appeared in Kangxi years , and the Binxing school had become a kind of donation organization.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 the thirteen states in Guangxi Province had set up a large number of Binxing organizations. Binxing was a cooperated product of the feudal country and the local gentry , and the national policies were able to practice in locals and the gentry participated in the local affairs actively. Binxing impell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 promoted local enlightenment and maintained th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borders.

Key words: in the Qing Dynasty Guangxi Binxing the enlightenment and stability

Negotiation between China ' s Xinjiang and USSR (Russia) on the Issue of Extradition and Trade in Yang Zengxin (杨增新) Period Hao Jianying (68)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Soviet regime of Russia , historical issues mingled with new ones to threaten Xinjiang ' s security and stability , and among that , the extradition of old Russian consuls , refugee , defeated soldiers and trade had become the key issues for negotiation. As a governor of Xinjiang province , Yang Zengxin managed actively , cooperated 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 argued on the basis of reason with the peace policy , thus properly resolved the disputes of extradition and mutual trade , and made the USSR (Russia) a balance force to Britain as soon as part sovereignty was retrieved.

Key words: Yang Zengxin Xinjiang Russia (Soviet Russia) bargaining

On the Uighur Agronomist Lu Mingshan (鲁明善) in the Yuan Dynasty

..... Shang Yanbin (77)

Lu Mingshan was a famous agronomist in the Yuan Dynasty. He was born in Gaochang (Turpan in Xinjiang now) and then moved to the interior , and wrote *Nong Sang Yi Shi Cuo Yao* (《农桑衣食撮要》) , which has come down up to now and has a unique value in the agricultural history of China. This paper examines his name , place of birth , official experience and other related issues on the basis of studying the inscriptions in the Yuan Dynasty and other literatures , and analyzes his attitudes to conduct himself in society and his political ideal.

Key words: Uighur agronomist Lu Mingshan deeds

The Inland Altars and Temples (内地坛庙) of Xinjiang in the Qing Dynasty : the Movement of Population , Governmental Policies and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 Jia Jianfei (90)

After the unification of Xinjiang by Qing dynasty , the government encouraged the inland people to move to Xinjiang in order to alleviate the population pressure , develop Xinjiang and defend the borderland. Inland culture gradually spread and rooted in Xinjiang , especially in the Northern area , along with the migration of inland people. The altars and temples were important component of inland culture and were widespread in Xinjiang to form a strong atmosphere full of inland culture , which attracted more inland people , strengthened their understanding and identity to Xinjiang , and consolidate the rule of Qing over Xinjiang. Based on Manchu and Han archives as well as other materials of Qing Dynasty ,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s of inland altars and temples in Xinjiang.